

變遷的初步研究〉，《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頁15—38；文煥然著，文榕生選編，《歷史時期中國氣候變化》，濟南：山東科學技術出版社，2019；龔勝生，〈中國疫災的時空分布變遷規律〉，《地理學報》，2003年，第6期，頁870—878）。利用樹輪、冰芯分析結合歷史文獻的做法並不少見，都是通過建立起史料編排序列，尋找異常分布的時空規律，進而概述這種變化的社會影響。在這一點上，本書的資料處理似乎沒有太大突破。魏特夫(Karl Wittfogel)和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等學者都已經關注到社會行動的生態背景，而作者選取的災荒價格指標更直接反映出環境壓力對民眾社會生活的影響。作者能夠通過災荒糧價把價格史和歷史氣候研究聯繫起來，並且考慮到官方財政價格、市場價格和災荒價格的生成機制，真正呈現出明朝人所「體驗」的小冰河期社會生活，這是本書的方法論意義。在史料運用方面，第二章中的一般物價水準表，也是官價資料為主，以訴訟材料與傳教士記錄作為輔助說明。作者並未詳細闡述買辦制度運作中這些價格的生成機制，及其與市價的距離，乃至估算的結果可信度大打折扣。作者在第五章考察短期物價變動時，也無法解釋《程氏染店查算帳簿》中的米價為何在非極端氣候年限居高（頁151）。除了價格生成機制的不夠明晰，在物價水準與普通民眾的工資水準之間，也只有形式的對應，缺少對日常消費品，尤其是肉類獲取途徑的解讀，而這或許是聯結價格變動與民眾「體驗」的缺失環節。此外，作者相信，明朝人在日常生活中處理事務已經表現出一定的經濟理性。他同時希望，官定價格與人們實際支付的價格不能相去甚遠，因為人們普遍期望定價與實際價格公平地接近（頁143），而這很難說不是一廂情願。

梁穎祺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珠海）

***Chinese Sojourners in Wartime Raj, 1942-1945* , By YIN CAO.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2. 178pp.**

1943年1月5日下午，十多名印度警察闖入了加爾各答派克街的一家商鋪，抓捕中國商人陳孟昭。他被指控勾結美國飛行員，通過從印度向中國走私而牟取暴利。陳孟昭被捕後，很快由中國軍事警察移交至重慶，並於同年10月被蔣介石下令處決。這則關於走私者的案件，是曹寅的新書 *Chinese*

*Sojourners in Wartime Raj, 1942-1945*中的一部分。除此之外，書中還有二戰期間旅居印度的華人水手、逃兵、飛行員等「小人物」的精彩故事。

曹寅利用英國國家檔案館、大英圖書館、印度國家檔案館、臺灣國史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等機構的豐富史料，以「微觀史」的概念，從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旅印華人的底層視角出發，自下而上地觀察他們在跨越區域過程中產生的身份變化。同時，他考察了這種流動與變化過程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對國民黨政府國家建構( State-Building) 計畫的影響，以及給英印政府造成的殖民焦慮( Colonial Anxieties) 。

本書第一章講述了滯留印度的中國水手，是如何在「逃避統治」的抗爭中加劇了國民黨政府與英印政府之間的猜忌。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超過3000名中國水手滯留印度加爾各答。國民黨政府和英印政府制定計劃，通過建立「中國海員戰時工作隊」來管控這群水手，並將他們轉變為戰時勞動力。中國海員戰時工作隊屬於國民黨政府的海外國家形象構建計畫，旨在爭取國際認可與美國援助。然而本該受到管控的這批中國水手，採用各種策略來逃避控制和監管。一部分人逃向孟買，大多數人拒絕加入工作隊並成立「中國海員禮儀促進會」與其抗爭，甚至在1942年底引發暴亂與國民黨政府決裂，激烈地挑戰了中國政府的民族主義話語。工作隊在管控上的失敗，也引發了英印政府的警惕。從一份情報機構的檔案資料中可以發現，英印政府懷疑中國要藉助加強管控的理由來為這些海員建立擁有治外法權的租界。這揭示了中國國民黨的國家建構計畫的局限性，並為我們提供了對普通人在民族主義、殖民統治面前「逃避統治的藝術」的新見解。

第二章則是關於3名中國走私者的經歷：陳孟昭僱傭美國飛行員從事走私生意；高文節偽裝成中國軍官以避開海關進行走私活動；雲南省防空司令部參謀王禮安被雲南省防空司令部附屬醫院派往印度進行藥品走私。上述三人都在20世紀43年初被當地警方逮捕並遣返回中國。中國人在盟國領土上經營走私並賄賂盟國飛行員，與國民黨政府急於打造的文明大國形象形成了鮮明對比。在這種背景下，打擊走私、處決人犯更多的是為了挽救中國當局的顏面。有趣的是，以往的研究強調，二戰期間中英當局在印度的緊張關係主要歸因於蔣介石對印度民族主義運動的公開支持，以及中國商人在印度猖獗的走私活動。而作者在本章中論證：相比中印邊境走私活動，英國當局對中國政府試圖約束在印中國人的舉動更為擔憂。在英印政府看來，後者是中國試圖向印度施加影響力、覬覦印度主權的陰謀。這個案例也說明一個國家的國家建構、民族復興絕不只局限在國內，它一定是在與其他國家的互動中被

限制、被影響的。中國民族主義關切與英國殖民焦慮之間的溝通不暢，導致對印度華人的監視、限制和起訴。

與以往美化和浪漫化中國遠征軍的線性故事敘述框架不同，作者在第三章講述了1940年代一個中國遠征軍逃兵和他的冒名頂替者在印度流亡謀生的故事。這個故事背後，是英印政府「大博弈」(Great Game)地緣政治焦慮和國民黨政府的國家建構計畫之間的誤解與摩擦。中國遠征軍中出現的大量逃兵，促使國民黨當局找尋控制逃兵的辦法；而英印政府擔心這些逃兵會帶來社會問題，甚至充當中國政府的情報人員。再加上英國當局長期以來擔心中國政府會干預東南亞殖民地的華僑事務、蔣介石對印度民族主義運動的支持、中國在印度的軍事集結以及甘地發起的「退出印度運動」(The Quit India Movement)造成的政治危機，英印政府逐漸改變對印度華人社區的政策，同時加強了對中國滲透的監控和法律執行。

第四章以拉合爾初級飛行訓練學校(LEFTS)為案例，描述英印政府和國民黨政府之間圍繞訓練學校的爭議。該學校在1943年建立，於二戰結束時撤離，旨在培訓中國飛行員和機械師。對中國而言，受訓飛行員和飛機是國家的重要資產；而英國當局擔心中國人在印度會消耗過多本應提供給英國的戰備資源，甚至可能在戰後成為英印政府潛在的敵人。隨着二戰結束，國民黨政府急需更多的空軍人才投入內戰，但拉合爾的中國學員和軍官卻因英屬印度即將結束的混亂局勢而遲遲不能回國。作者將拉合爾初級飛行訓練學校的故事置於英國撤離印度和中國內戰的廣泛背景下，利用這一案例，從普通人的視角揭示了印度和中國歷史上兩個重要事件之間的聯繫。通過這種方式分析這些事件，相比於傳統的民族國家敘事框架，更能讓我們重新理解印度和中國的現代歷史。

自1962年中印戰爭以來，武裝衝突、領土爭端、西藏問題以及兩國之間的政治關係，主導了關於中印聯繫的學術研究和媒體話語。相關研究也較多地將中國和印度置於政治地理與民族國家的基本框架中。而戰爭與邊境爭端對非國家主體(Non-State Actors)的影響以及民間社會成員之間存在的持續聯繫，在出版物中很少被提及。(Adhira Mangalagiri, Tansen Sen, "Introduction: Methods in China-India Stud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 2 (2022): 180) 實際上，中印之間的交流與聯繫在空間上更為廣泛，涉及的人群也經常跨越地緣政治的邊界或者轉變身份。[Tansen Sen, "China - India Studies: Emergence, Development, and State of the Field,"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80: 2 (2021): 13] 正如作者所言，他研究的水手、走私者、逃兵、飛

行員和機師等群體的身分並不是獨立的，會有很多交織與流動。有時候逃兵會選擇去做走私生意，有時候水手又會被政府當作逃兵對待。(Yin CAO, “The Return of Chen Ching Lin: Chinese Deserters and Chinatown in the British Raj, 1943-46,” *South Asia: Journal of South Asian Studies* 44: 5 (2021): 888-902) 本書將跨越國別區域、能夠轉換身份的普通人的歷史故事納入到20世紀40年代中印關係的時代背景中，並且同時兼顧英屬印度與中國的政治發展脈絡，是一種非常有益的嘗試。

除了書中提到的英帝國以及印度繼承者的情報資訊網絡以外，實際上國民黨政府很早就英屬印度建立起了情報組織。中華民國的國際問題研究所和中統、軍統等情報組織，與英國特別勤務處(SOE)、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SACO)之間的戰略合作與抵牾衝突，可能也是引起英印政府殖民焦慮的重要原因(Liao Wen-shuo, “Between Alliance and Rivalry: Nationalist China and India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Beyond Pan-Asianism Connecting China and India, 1840s - 1960s*, eds. Tansen Sen and Brian Tsui,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350-377)。上文提到的普通人的身份標籤轉換，是否也會被20世紀40年代中、英、印政府部門戰略性地運用於各種政治議程之中？此外，走私活動是非法的，但走私路線在特殊背景下是能為官方所用的。國民黨政府曾派遣軍官通過中緬印戰區之間的走私路線前往印度運輸藥品；英國特別勤務處也在1944至1945年間發起了「悔恨行動」(Operation “Remorse”)，招募中國特工通過中緬印戰區之間的走私路線進入中國的敵佔區，以鑽石、手錶和鋼筆等換取藥品、橡膠等重要戰略物資(Robert Bickers, “The business of a secret war: Operation 『Remorse』 and SOE salesmanship in Wartime China,”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16: 4 (2001): 11-36)。因此，對於英國而言，沒有採納國民黨政府意見在印度機場設立檢查站禁絕走私不僅僅是殖民焦慮，也可能是出於自身軍事、情報、商業等方面的需要。這些問題有待中國、印度、英國與美國等多邊檔案的進一步挖掘，也有待於未來更多的與20世紀40年代案件相關聯人員的口述訪談。總之瑕不掩瑜，作者用「顯微鏡」的方式，展現了這些旅印華人群體在中、英、印等不同政府治下的複雜命運。這是目前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旅印華人群體最好的著作。

王澤軍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暨民間記憶與地方文獻研究中心